008987

嵊县教育志

浙江省嵊县教育局编纂

嵯县教育志

谢希德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七日

《嵯县教育志》编纂工作人员

教育局分管领导：

李 旭

编纂小组成员和工作人员：

组 长：董先荣

副 组 长：
兼 主 编：求达人

副 主 编：樊云瑞

编纂人员（按姓氏笔划）：丁宗文 马尚骥 王 恒 求达人 钱大莘

樊云瑞 薛大津

特约撰稿：王一藩

摄 影：薛大津 黄庵仪

打 印：石海娟

主管审稿：董先荣

校 对：求达人

2

序（一）

教育乃人类文明之摇篮，维系着人类的命运和民族的兴衰。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发展经济靠科技，科技基础在教育。中华民族的腾飞在于教育的腾飞，嵯县的振兴在于教育的发展。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总结嵯县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探索教育规律，嵯县教育局编纂了这部教育志。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

《嵯县教育志》是嵯县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志，它的问世必将起到“存史、资政、教育”的作用，进一步推动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促进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嵯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教育事业向称发达，特别是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扫除了文盲，人民文化水平大大提高。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嵯县教育必将出现新的局面。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桃李芬芳，前程似锦。

本县教育界的几位老同志，自接受编纂教育志的繁重任务以来，他们本着一贯热爱教育的精神，不辞辛劳，广搜资料，遍访知情者，积累了700余万字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反复斟酌，数易寒暑，数易其稿，最终编纂成这部教育志。

《嵯县教育志》正文共18章，另加《概述》和《大事记》，共约60万字。它上溯东晋、宋齐间，跨度近1400年，对不同时期嵯县教育的历史，均能秉笔直书，如实反映。在编纂过程中，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力图突出时代特点，反映地方特色，揭示教育规律。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再加志书内容浩繁而资料缺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在《嵯县教育志》编纂过程中，曾得到嵯县县志办的指导，得到县内外教育界老前辈和广大同仁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志谢。

李 旭

1990年2月10日

序(二)

今年8月,组织上安排我到县教育局任职。其时《嵯县教育志》的编纂、印刷工作已接近尾声。接任伊始,我就想一睹为快,可惜忙于公务,未能如愿。后来通过努力,总算浏览了《概述》、《大事记》和其它一些重要章节,虽未尽窥全豹,但已略知全志的概貌。我总的印象是:志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字精练,条理清楚,只要一卷在手,嵯县古今的教育历史就可了然于心。毫不夸张,它确实称得上是一部嵯县教育的百科全书。

我国历来十分强调修志工作的社会功能。一般的意见认为,修志需达到三个目的:存史、资政和教化。

《嵯县教育志》汇集了大量的史料,通过分门别类、系统记述,使读者检索和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再通过印刷、发行,广为流传,“存史”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剩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发挥“资政”和“教化”的作用。

记得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有惊人相似之处。”当然这种“相似之处”并不是历史事件的简单重复,而是事物“否定之否定”的一种表现。唯其如此,所以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值得我们记取。这里不妨举几个志书中的例子。如近些年来,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中,整个教育系统常常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如何扩大办学的财源已成了当务之急。其实,翻开《嵯县教育志》我们就可以看到,前人在这方面早已作过有益的尝试,如征收各种教育费附加、动员私人捐资办学、建立各种教育基金以及奖励捐资办学人员等,在我县教育史上都曾实践过。又如教育如何为经济服务,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做到“三教”统筹兼顾,学校如何提高教育质量,等等,志书中均有不少记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我们能批判地继承,做到古为今用,我们的工作就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多出一些成绩。这说明,只要我们善于运用志书的资料,“资政”这一点也是不难做到的。

在阅读志稿的某些章节时,前人的那种为教育事业而无私奉献的精神很使我感动。马寅初“一不做官,二不发财”,一心走教育救国的道路;袁心粲独力创办“师范讲习所”,后来为了办免费的贫民教育,心力交瘁,大病几死;裘翌芳以校为家,用毕生的心血办好刻山小学,使这所小学长期饮誉县内;冯农别妻离子,离开优渥的城市生活,长期献身嵯县教育事业。又如石下阳村孀妇钱蕴秀,破家创办阳山书院;崇仁慈善家全禄甫先后出巨资创办寺前的士明学堂、崇仁的承志小学堂和昌言小学堂;前岗实业家俞旦屏,捐银币1.3万元,创建起祥小学;王珪孙为了创办私立春皋中学,也殚思极虑,尽智竭力。看了上述先贤的事迹,人们会由衷地升腾起无限的仰慕之情,并且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感化。

《嵯县教育志》即将发行问世。我愿意和全县教育界的同仁们一道,认真开掘志书这座宝藏。随时翻检,借鉴历史,改进工作。

借此机会,我要向教育志编纂组的全体同志,向曾经支持过修志工作的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前任领导,是他们的热情关怀和支持,催开了《嵯县教育志》这朵妍丽的鲜花。

陈南炎

1991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为嵊县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志，其内容涵盖古今。

二、本志上溯东晋、宋齐间，下迄1985年底（部分内容延伸至1989年底）。

三、本志设正文18章，另有《概述》和《大事记》，最后附照片和地图。

四、正文按横排竖写的原则分章立目，全志的层次分为章、节、目，大、小目又按序数一、（一）、1、（1）、①排列。

五、根据志书体例，除《概述》外，一般述而不论。

六、各章、节后附有“附录”，附录包括附文和附表。

七、全志纪年采用两种形式：1949年10月1日以前采用历史纪年，必要时加注公历，如“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民国26年（1937年）”；此后概用公历纪年。

八、全志关涉到的人物可分三个层次：（一）人物传：生不立传，只选故人；遴选的主要标准为知名度，但也适当考虑代表性和地域性。（二）名录：根据统一的尺度选录。（三）因事系人：根据叙事需要适当联系，一般侧重于：1、对事件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2、与事件始、末有关系的人。

九、全志一般采用标准地名（即经《嵊县地名志》规范的地名）。

十、本志一般采用1985年末称说的校名和机关名，但在记述历史时则一仍其当时的旧称（必要时加注今名）。

十一、为了节省文字，全志使用了一些简缩语，其中使用频率高的有：“解放后”（指1949年5月22日嵊县解放以后）、“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共”（指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时期”（指1966年至1976年间）、“扫盲”（指扫除文盲）。简缩语一般只在全志或全章（节）始用时加注说明，以后则循例照免。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有五：（一）历代《嵊县志》（共10部）。（二）档案资料，包括嵊县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宁波市档案馆、嵊县统计局、嵊县教育局收藏的资料。（三）图书报刊资料。（四）校史资料，包括各校、各乡镇撰写的校史、乡（镇）教育发展史提供的资料。（五）口碑资料，由知情人士口述或记述的回忆资料。以上资料（除校史、教育发展史外）一般录有卡片，为了节省篇幅，本志在引用时未注明出处。如欲穷源竟委，可索之卡片或校史、教育发展史（存县档案馆）。

前 言

《嵯县教育志》的历史跨度较大，前后纵贯近14个世纪。

全书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正文；二、附件（包括《概述》、《大事记》和照片、图表）。

正文共18章。前6章为“硬件部分”，缕述各级各类教育的兴衰演变过程；考虑到旧学与新学各有特点，在记述上无法连贯，所以立专章以介绍旧学，另立5章分类介绍新学。后12章为“软件部分”，分别记述与学校教育有关的诸方面。本志将“硬件”与“软件”分开写，主要是为了撙节文字，免得前后重复；同时也考虑到，即使想将“硬件”与“软件”穿插起来写，也殊难贯穿到底，与其半合半分，还不如分开写省事。

《概述》与《大事记》是正文的浓缩。《概述》综合记述嵯县教育事业之全貌及其发展的总过程，并对嵯县教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作了一点探索，希望能起到提纲挈领、开宗明义的作用。《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辑录了嵯县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冀图能以简驭繁，帮助读者了解全志的脉络。

嵯县教育史上曾有不少学校面过世，有的在历代县志中有所记载，有的已湮没无闻，无法追述，这是非常可惜的。时不可追，我们只好措手于眼前，本志稿对近、现代曾存世的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搜录较广，以便为今人和后人在研究全县教育状况时留下一点雪泥鸿爪。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也出现了另一个弊端：部分章节的内容就显得烦冗些。

我国修志历来有重视记人的传统。本志稿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全志关涉到的人物当在1500位以上，其中入传的人物即达43位。近年来，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大力提倡尊师重教。我们认为尊师重教，在社会上固然要大力倡导，在我们教育系统内部更要以行立范，只有自己尊重自己，才能进而为人们所尊重。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罗致人物的面就较广，如终身从事教育、教龄满三十年的，我们不惮其烦，一一列入，以示对老教师们的献身精神永志不忘之意。

根据传统的观点，修志有三个目的，即存史、资政和教化，而存史又是后两者的基础。资料是志书的生命。为使重要的史料得以录存，编纂组同志曾四出奔波，广泛搜求。关心本志的一些嵯县教育界老前辈和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也纷纷提供资料，对此我们谨表感谢。但是全志的缺档还是不少，其主要原因是：一、嵯县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沦陷，此时此前的档案损失殆尽；二、“文化大革命”期间，嵯县武斗频仍，部分教育档案又遭损失。编纂组同志采取了不少措施，但缺档仍难以弥补。本志稿在记述资料时，基本上采用纵述始末的办法，但有时也偶与兄弟县（市）或省、市（地）的资料稍作排比，以便通过比较，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嵯县教育的地位。对此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教育现象错综复杂，志书记述纵横交叉，为了保持每一章节资料的相对完整，某些资料有前后重出的现象，这可能是势所难免的。为了尽可能减少重复，我们也采用“一处记述，他处加注”的办法，即前面已出现过的资料，后面再度涉及时只注明“另详×章×节”或“另详第×页”，这当然增加了人们往复翻检之劳。所有这些都是要请读者明鉴的。

《嵯县教育志》原计划向新编《嵯县志》看齐，下限定为1985年。在总纂时又考虑到

1985年以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比较迅速，一些全县性的重大事项有必要加以记述，同时，省、市教育志的下限均定为1989年，但是限于人力，各章节要全面增补又不大可能，所以只将基础统计资料、全县性事项和大事记等内容延伸到1989年底。如后人续编，可从1986年写起。

历来志家强调特色。本志稿的特色是什么呢？这只好留待读者去评说。但有一点可以提一下，即全志涉及面较广，学生、教学、德育、美育、劳动教育都列章记述，力求能反映嵯县教育的全貌。如果“全”也算是特色的话，那么编纂组的同志在这方面确实是倾注过不少心血的。附带说明一点，“智育”没有列专章，这是考虑到在“教学”、“学制与课程”等章已涉及到了，就不再列章赘言了。

童先荣

1991年5月

概 述

嵊县历史悠久，据地下文物探明，早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先民在繁衍生息、创造文明。

嵊县建制始于何时已无复详考，仅知西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已置县，为会稽郡36县之一，名剡。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现名。其间曾易名“尽忠”、“剡城”和“贍”，唐初并曾短期升置为嵊州。

嵊县辖境大的变动有4次：东汉永建四年（129年），析剡县北，合上虞县南，另置始宁县（县治在今三界镇附近）；隋开皇九年（589年），撤始宁县，划其南乡复归剡县；梁开平二年（908年），析剡县东南13乡另置新昌县；1958年11月，新昌并入嵊县，1961年10月，嵊、新又重新分县，原属新昌县的黄泽镇划归嵊县。

嵊县四境环山，中为盆地。地理位置为东经 $120^{\circ}27'23''$ — $121^{\circ}06'55''$ ，北纬 $29^{\circ}19'45''$ — $29^{\circ}49'55''$ 。全境面积1784.43平方公里。其地貌结构为“七山一水二分田”。

二

嵊县教育发展较早，自古迄今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封建教育阶段

1、南北朝及其以前——嵊县封建教育滥觞时期

东晋以前，于史无征。东晋初，北人南迁，“中朝衣冠尽寄南国”，一些文人学士歆慕剡中山水，纷至沓来，出现了“王谢寄迹，风流弥繁”的局面。王羲之栖隐金庭，谢玄、谢灵运祖孙卜居始宁县江曲（今三界镇附近），戴逵、戴颙父子结庐城隅。据查：王羲之徙居金庭后曾“建书楼”、“教子弟”（见新编《嵊县志·人物传》）。宋齐间，盐官人顾欢来剡“开馆授徒”，规模较大，生徒“近百人”（见乾隆《嵊县志》）。同时据志书载，宋、齐、梁三朝，剡县已有一些人受荐辟出仕。

2、隋唐至两宋——嵊县封建教育发展与鼎盛时期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行科举，唐天宝十二年（724年），敕令“天下乡贡举人，不由县学者勿举”（见《文献通考》），嵊县县学由是应运而生。嵊县县学与学宫（孔庙）始终合署。宋崇宁五年（1106年），县学扩建，时有文士50名，武生缺，另附设小学1所，有学生40名。南宋时期，全国政治中心南移，大量北人南迁，嵊县教育亦趋繁荣。时有县城周氏渊源堂义塾、金庭王氏义塾和晋溪姚景崇义塾。淳熙初（1174—1180年），吕规叔在贵门山首创鹿门书院；绍定年间（1225—1233年），竺伯勤（字竹楼）在县城创办竹楼书院。书院办学宗旨与县学、私塾有异，实行

授课、讲学与研究学问并重的原则。南宋时期，嵊县士子习举业者甚夥，中式的举人、进士人数列诸代之冠，形成了鼎盛的局面。

3、元至晚清——嵊县封建教育持续与衰微时期 元代政府为了控制教育，提倡办官学，嵊县除官办二戴书院问世之外，余无足道。明代嵊县先后有慈湖书院、东楼书院、艇湖书院、鹿山书院、宗传书院、长春书院面世，但兴废无常，其中宗传书院为嵊县著名学者周汝登所创建，周常邀外地学者来院讲学、辩难，颇著于时；慈湖书院则被列为当时全省著名书院之一（见《浙江教育简志》）。明代新设的名塾有经训堂书塾、石壁草堂；金庭王氏义塾尝废而复建，并一度改名心传书院，至南明小朝廷时期（1644—1661年），影响骤增：“南明学者咸集焉”，俨然成为一方名学。清代新建的书院有鹿鸣书院、剡山书院、辅仁书院和阳山书院，其中剡山书院长期饮誉，与官办二戴书院并驾齐驱。义塾和义学也大量涌现，民国《嵊县志》记载的有32所。至晚清，在列强的欺凌下，传统封建教育的弱点暴露无遗，清廷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下诏废科举、兴学堂，于是封建教育走向式微，嵊县各地的书院、义塾和私塾也纷纷改换门庭。

（二）以资产阶级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阶段

1、晚清时期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革命党人姚麟开县内风气之先，在县城建宅（侨园）创办师曾学堂。次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于是全县各地的书院、义塾竞相改办新学。光绪三十一年，嵊县县立中学堂问世；同年，县城冯筱村女塾改办爱华女学堂。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嵊县县立初级简易师范学堂和女童（幼儿）蒙养院创办。宣统年间（1909—1911年），成人（社会）教育也新枝初绽，全县创立简易学塾4所。至宣统三年，全县有县立小学堂2所、私立小学堂64所。

2、民国时期 嵊县教育续有发展。民国4年（1915年），嵊县县立中学校重建。民国8年前后，私立事斯乙种商业学校开办；同时县民众教育馆成立，负责开展社会教育工作。民国22年，为了推行义务教育，全县试办短期小学。民国24年，全县推行国民教育，改小学为国民学校，学校设民众教育部，主办成人班和妇女班。民国26年冬起，杭州市私立清波初级中学等6所外地学校先后避难迁嵊。民国29年、31年，私立春皋初级中学、阳山初级中学先后创建。民国33年，嵊县中学开办高中班。民国34年，全县实施“强迫教育”，县和少数乡成立“强迫教育委员会”，推行义务教育。民国35年，县立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开办。民国37年秋，全县有中心（或代用中心）国民学校48所、私立小学8所、保国民学校342所、私立初级小学40所，有县立中学1所、私立初中2所、县立简易师范1所、县立初级农校1所。

（三）社会主义教育阶段

1、改造、恢复和发展时期（1949—1965年） 1949年5月22日，嵊城解放。6月，嵊县人民政府接办嵊县中学。此后又陆续接办全县其它中小学。全县各中小学认真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工农子弟入学人数与日俱增。在改造和恢复的同时，全县教育发展也较快。1950年2月，私立崇仁初级中学创办；5月，五联（今卮山）乡农忙幼儿班开办；同年冬，全县普遍开展以扫盲为中心的冬学运动，有42138人入学。1951年春，全县不少冬学转为常年民校，其中中南乡“婷婷娘（“姑娘”之意）民校”被列为全省的先进典型。1952年3月，城关镇民办五爱幼儿园创办；5月，县级机关学校开办。1956年秋，北山、三界初级中学开办。1957年，民办中学和农业中学兴起。1958年，城东、上东、里东、苍岩、石璜、南山初级中学创办。至此，全县每区已至少有1所公立中学。同年，全县还掀起了大办农业中学的

热潮。1961年9月，嵊县中学、甘霖中学、上东初中和崇仁区校、新联社校、城关镇校（今鹿山小学）被确定为县重点中、小学。1963年秋，为提高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各地兴办简易小学（1964年改称耕读小学）。1964年11月，推行“两种教育制度”，三界初中被改为半农半读初级中学。

2、“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1966年6月中、下旬，“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学纷纷“停课闹革命”，直至1968年秋才复课。此后小学和初中、高中，学制分别缩短1年，公办小学曾下放到大队（村）办学，高校、中专招生实行推荐与选拔制。同时，在“学校办到家门口”这一口号的鼓动下，各地竞相发展中小学，1976年，全县有完中或高中75所（为“文革”前的18.7倍），初中和小学附设初中303所（为“文革”前的17.8倍），教师层层上拔，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3、拨乱反正、改革发展时期（1977—1985年） 1977年冬，国家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1978年3月，嵊县教师进修学校创办。1979年秋，嵊县财贸技工学校和临城中学创建。1980年4月，经扫盲验收，开元公社（乡）成为全县第一个基本无盲社；9月，为推动全县勤工俭学活动，嵊县校办企业公司成立。1981年2月，剡山小学、崇仁区校被确定为县重点小学；9月，嵊县中学被确定为省第二批重点中学。1983年9月起，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改革中等教育的结构，普义中学高中部改招农业职高班（次年2月又改为县农业技术学校）；同年，在省教育厅的支持下，全县建立农村初中理化实验中心14个（翌年增至19个）。1984年下半年，经省、市工作组验收认定，嵊县成为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县和基本无盲县；同年9月，上东、南山、北山、石璜、临城中学的高中部分别改招农业职业班。1985年9月10日，城关和各区、乡集会庆祝第一个教师节；11月，临城中学改为县工业技术学校；年底，全县中小学开始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从80年代初起，学校经过整顿，网点布局渐趋合理，至1985年秋，全县有小学753所、初中61所、普通高中8所、职业高中7所，另有教师进修学校、电视大学工作站和各种成人业余学校，做到区区有完中或高中（包括普高和职高）、乡乡有初中、村村（行政村）有小学。

三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嵊县教育有如下特点：

（一）办学较早

- 1、塾学 早在五世纪的宋齐间，顾欢已设馆授徒。至南宋，嵊县有3所义塾。
- 2、县学 在唐代建立，为全省最早建立的7所县学之一。
- 3、书院 宋代浙江省有近70所，嵊县占2所（鹿门书院与竹楼书院）。
- 4、幼儿教育 嵊县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曾建立蒙养院。
- 5、初等教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通令各省改书院为学堂，时隔三载，姚麟即在鹿胎山创办师曾学堂。
- 6、女子教育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才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而谢飞麟已于光绪三十一年创办爱华女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周锡庚、周志由还在石楼对村创办大同小学堂，率先实行男女同校。
- 7、中学教育 嵊县县立中学堂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而据光绪三十四年统

计，全省仅县立中学堂9所（另有府中学堂11所）。嵊县中学于民国33年（1944年）创办高中部，并于民国35年获准改为正式完全中学，据民国37年上半年统计，全省县立完全中学仅14所。

8、职业教育 嵊县初级简易师范学堂创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为当时全省18所师范学堂之一，并拔了绍兴府的头筹。

9、成人教育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当年嵊县即有“简易识字学塾”4所。清代末年，嵊县的有识之士还曾办过公立夜课学堂和僧人学堂。

（二）社会重视

1、有捐资、集资办学的优良传统 早在南宋时期，王羲之的29世孙王愷拨田300亩设置金庭王氏义塾。据民国《嵊县志》载：清代全县有学田（不含私塾）、课士费田、童试田、乡会试田、膏官田、学册费田共2964亩（另有地、山、塘690亩），其中1500亩即为私人捐赠，吴金和捐田220亩，名列榜首，其次为魏懋和（80亩）、钱沛（50亩）。同治年间，太平乡石下阳村孀妇钱蕴秀捐“家资之半”（银币3000元，田120亩）创办阳山书院，泽被桑梓，口碑久传。光绪三十三年，崇仁慈善家金禄甫购买寺前村显净寺，创办士明高等小学堂，翌年又捐资创建承志小学堂，并拨田120亩以为恒产，后又捐资创建昌言小学堂。民国14年，实业家俞丹屏捐银币1.3万元，为故乡创建起祥小学（今卮山小学），该校曾长期饮誉四明山区。民国时期有不少人捐资兴学而受到政府褒奖，其中受到国民政府或“总统指令”颁奖的有黄桂馨、汪正金、钱体伦、竺履谦、赵汉庭、宋锡舟、安我华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国家办学和集体办学，但80年代初以来，捐资办学的风气又盛，如1984年开办的城关二中，其开办经费的大部分（50万元），即由厂矿企事业单位解囊。其它如马仁村、竹溪乡、山口村和明山公社（乡），在集资办学方面也卓有成效。

2、有一批热心办学的人士 长期来，嵊县教育比较发达；这与有识之士的热心办学分不开。宋淳熙初，吕规叔创办鹿门书院，首开县内办书院之先河。宋末元初，东林人许瑾，明于理学，教育学生能“随其资禀”，做到“皆厌足所欲”，后双目失明，仍“以口授后学”。明代周汝登，曾官至户部右侍郎，他不论从政与否，均热心办学，挂冠蛰居后，更倾心育才，先后创办了鹿山书院（与人合办）和宗传书院，亲自讲学传道，乐此不疲。清代邢复旦，曾任贵州天柱县知县，解职后长期担任剡山书院山长（院长），教绩甚殷。清末民国初，嵊县教坛涌现了一批风云人物，他们集革命家与教育家于一身。谢飞麟创办爱华女子学堂，被人誉为当时浙东女权运动的一大盛举。周志由在宣统二年出任县劝学所总董时，曾督促新办小学20所，民国初，又积极重建嵊县县立中学校，亲任校长。姚麟首创嵊县的新学（师曾学堂），后又在嘉兴、绍兴等地积极推行新学和女学。裘翌芳于民国元年担任私立剡山小学校校长，直至1959年逝世，终一生于斯任，他惨淡经营、勇于进取，使剡山小学久膺盛誉。民国初，新学崛起，师资奇缺，袁心粲独力创办“教师讲习所”，推行教育科学，其胆识，可风可嘉。民国10年，裘配岳出任嵊县中学校校长，他尽献三年薪金并自掏腰包用以改善办学条件，在他的带动下，学校终于集资建造了教学楼，充实了图书仪器。民国13年，嵊县中学校长郑鹏冲，勇于开拓，学校根据社会需要，附设乡村师范班及其附属小学，推行“教学做合一”，翌年又在毕业班开设商业、养蜂、蚕桑、农业基础知识和教育学等选修科，为毕业生就业开辟新径。抗日战争期间，尽管形势严峻，但嵊县教育，特别是中等教

育呈现较为繁荣的景象。民国27年，邢传新返乡未久，即倾多年私蓄创办“坎流中学生补习学校”，后又以身殉职。民国29年，王珪孙创办私立春皋初级中学。2年后，钱希乃等人在阳山书院院产的基础上创办私立阳山初级中学，钱出任首任校长，他长期来热心办学，积极推广教育科学，曾获省教育厅一等奖励。民国32年，县立简易师范重建，时局维艰，刘章新临危受命出任校长，在逆境中育才。解放前夕，大学教授冯农，放弃优渥的生活待遇，出任私立阳山中学校长，尔后近20年时间，远离家庭（老伴等均在北京），孤身一人，为嵊县教育事业殚精竭虑，最后老死嵊县。1950年冬，苍岩一村俞婷婷，积极创办冬学，动员农民学习文化，“婷婷娘民校”的办学精神和经验曾在县内外推广。60年代初，东坑公社（乡）牛团仓小学民办教师姚喜娟、蒋镇公社高入山小学民办教师赵辅康，根据山区特点，创办“一揽子小学”，方便儿童入学，深受群众欢迎，他们的办学经验曾在县内外推广，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往访者络绎不绝，姚喜娟还参加省巡回报告团去外地介绍经验。

3、有不少长期坚持办学的社会群体 这种群体在全县为数不少，但从办学的长期性和坚持性方面来看，当首推金庭（华堂）王氏家族。华堂王姓为王羲之之苗裔，长期来有耕读传家的遗风。南宋王恺创办金庭义塾，此后虽曾有废圮，但其族人一直将义塾（明代曾易名心传书院）赓续到晚清，光绪二十九年又改办为金庭高等小学堂。抗日战争期间，王氏族人王士彬（为回乡科技人员）等人又创办金庭战时补习中学，“文化大革命”期间，该乡（当时称新合公社）半农半读的大雾山中学曾名噪一时，至1985年，这所学校（已迁址并易名为金庭农中）成为县内唯一的乡办农中。800多年来，金庭王氏家族和金庭人这种锲而不舍的办学精神，实堪旌表。其他如县城周氏家族、支鉴路村支氏家族，在坚持长期办学方面也有优良传统。

4、不少地方官员（或政府领导人）重视教育 宋庆历年间，知县丁宝臣为政“首重学校”，曾兴修“殿舍”（孔庙），“重建县学”。宋嘉定年间，县令史安之到任甫始，即收缴历欠赋税，尽充教育经费。明成化年间，知县许岳英“以教化风俗为急”，新建社学，重建官办二戴书院，并且“丈田均赋，以盈田充学田”。明隆庆年间，知县朱一柏亲为士子讲课，一方面在生活上关怀，“厚其（士子）既廪”，另一方面又严格要求，“月凡二试，亲为甲乙，终岁无惰”。清康熙年间，知县宋欽多方筹措学田，屡将讼产和“无号田”判充，如一次僧俗争田，宋即判43亩归义学，30亩归清风祠。清光绪年间，前后任知县毕奎、陈次耕，力排旧势力的阻难，邀蔡元培来嵊主持两书院学政。上述地方官员以其籍籍之教绩，垂范于后世。迨及晚近，政府领导人中也常有教绩殷著者。1956年，冯农当选为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后，即造访各中学，与教职员工沟通情感，平时有教师上访，必热情接待，教师有困难，也亲予过问。1984年上半年，方浩泉就任副县长伊始，即会同教育局等部门的领导人，积极筹措，多方说项，集资50余万元（另加县财政拨款30万），使城关二中得以当年招生开学，并使城关镇提前实现了普及初中教育的历史任务。近年来，长乐镇委、镇政府，根据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需要，决心征地25亩，集资100多万元，新建镇初中教学楼（区），前后任党委书记金昌进、李祝安，甘当现代武训，亲自向各界募捐，

（三）善于借重外来力量

在嵊县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外来力量曾起过重要作用。志书记载：宋齐间创办第一所学馆的顾欢，原籍盐官（今海宁），他定居剡县后，长期作冬烘先生，最后卒葬剡山。南宋时首创鹿门书院的吕规叔系金华人，创办竹楼书院的竹伯勤系会稽（今绍兴）人。南宋初，县

城的周氏渊源堂义塾礼聘乐清硕儒王十朋为师席，由是名声远播，不少温（州）、台（州）、金（华）学子负笈景从，周氏一门更受惠非浅，先后“登科（考上进士）者七人”（其中一人前此已登科），“受举荐者十数人”，文物之盛冠于嵊邑。迨至清末，近代著名教育家、山阴（今绍兴）蔡元培，当他受到守旧派攻击，愤而辞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职务之后，嵊县的地方官员和有识之士，立即邀请他来嵊担任剡山、二戴两书院的山长，他积极推行新学，并为两书院制订学约十条，影响至为深远。抗日战争期间，杭州市私立清波初中、省立宁波中学、省立绍兴中学、省立锦堂师范和省立杭州蚕桑职业学校先后栖嵊办学，一时弦歌四鸣。这固然与“天时”（抗战期间）、“地利”（嵊境多山）有关，但主要的还在于“人和”——嵊县人乐于接纳，愿意提供各种方便。如清波中学在石璜复学后，学额爆满，原校舍难敷所用，开元士绅及教育界人士周樟潮（时任开元小学校长）等人热情相邀，并主动让出原开元小学的房屋（开元小学则另辟新舍），石璜人也曾设法挽留。这些外来学校为嵊县培养了不少人才，如嵊县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商燮尔、吕灿仁均曾受学于滞嵊时期的宁波中学；锦堂师范曾在长乐石阳村滞留4年之久，为嵊县造就了大批师范毕业生，此后，石阳附近长期成了教师之乡，清波中学创于杭州而盛于嵊县，它在嵊7年中，为嵊县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不少革命志士成了地下党组织、革命武装力量的中坚分子。一个具有强大同化力的群体也必然具有强大的异化力，这是一种令人饶感兴味的历史现象；早期借重外来力量，到了晚近，嵊县教育人才却活跃于县外。以杭州、绍兴两地为例，50年代初浙江大学校长马寅初、杭州一中校长裘颂兰、杭州女中校长袁心粲和绍兴中学校长钱叔亮、稽山中学校长裘敬熙、绍兴师范校长钱希乃均系嵊籍人。

四

以史为镜，可鉴来兹，重温嵊县教育史无疑能给人以不少启迪。

（一）关于普及教育

康有为早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请开学校折》中就提出兴办“国民学校”的建议，主张“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其不入学，罚其父母”。此后全国各地曾以缓慢的速度推行过普及义务教育（不同时期有“国民教育”、“强迫教育”等不同的名称）。

嵊县推行普及义务教育始于民国8年（1919年）。据《嵊县劝学所8年度学事年报》载：“实行义务教育，自以普设国民学校为前提，改良私塾为学校教育之补助。”为了推行国民教育，是年开始在全县推广国语（普通话），改设区立小学，创办半日制小学（崇仁区）和暑期夜校（剡山小学附设）。民国24年起，全县推行第一期普及义务教育（为期5年），是年定为“儿童年”，并且举办短期小学，培训塾师，推广简体字。通过一年努力，小学增加了54所，学生增加了3821人，教育经费增加了17228元。民国30年，实施强迫教育，县和部分乡成立了“强迫教育委员会”。民国33年定为“教育年”，通过推行国民教育，嵊县接近达到“一保一校”。通过30年的努力，小学教育虽有了发展，但离普及的目标仍很遥远。民国时期，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从来没有达到过60%，而文半盲的比例，民国28年为75%，民国31年为74.82%（另详本章附录一、二）。

解放后，为了普及小学教育，曾作过长期的努力。解放初，国家分期分批接办了全部中小学，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积极动员学生入学，并且取消学费。1952年，小学在校生比1949年增加了68.9%。1953年，通过贯彻“大力整顿小学，控制数量，保证质量”的方针后，小学数量减少，但此后教育质量有了提高。1955年起，根据“积极提倡，加强领导”的原则，发展了民办小学。1957年小学在校生比1952年又增加了16.2%。1958—1960年期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急于普及小学教育，小学生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71.08%，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4.5%。由于超越了主客观条件，尔后又遇上三年暂时困难，1961年起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部分公办小学转为民办。1962年小学在校生比1960年减少21.39%。1963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也降至79.2%。1963年后，采取“两条腿走路”和“多种形式办学”的方针，农村各地曾兴办过简易小学（不久改称耕读小学），小学生人数又逐步回升。1966年开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耕读小学停办，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公办小学教师实行回队任教，小学实行“五年制”，学龄儿童入学率上升，但流生率高，教育质量严重下降。1978年后，调整了学校网点，在继续抓入学率的同时，着重抓巩固率、毕业率和普及率（合称“四率”）。至1984年秋，经省、市验收，嵊县终于成为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县。

为了普及初等教育，县人整整奋斗了65个年头。回首往事，人们不难发现普及初等教育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和曲折性。展望未来，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图景将更加壮丽，同时也更任重而道远。

（二）关于教育的内部结构

教育是社会这个母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教育不仅受社会的制约，而且还得对社会提出的各种问题作出应答。教育的主要职能在于培养人才，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却是多层次、多门类的，因此教育就不能以一种模式来培养人才，这就要求教育部门能优化内部结构。

如何优化教育内部结构，一个世纪来的教育实践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晚清时期，新学伊始，嵊县的普通教育即初具规模，中小学数量之多曾跃居全省第二、三位。同时，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也初露端倪，初级简易师范和简易识字学塾、公立夜课学堂、僧学堂均先后问世。民国时期，普通教育续有发展，职业教育顺应时代的需要，先后举办过的师范类学校（班）有师范讲习所（民国初，附设于剡山小学）、嵊中乡村师范班（民国18年）、简易师范（民国32年），农业类学校有蚕桑传习所（民国18年）、初级农业技校（民国34年），商科类学校（班）有私立事斯乙种商科学校（民国8年）、剡山小学附设商科班（民国8年）、私立柏林商科职业学校（民国17年）。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嵊县中学和剡山小学作为普通中小学，都曾面向社会，举办过职业培训班，嵊县中学除乡师班外，民国19—22年在毕业班增设商业、养蜂、蚕桑、农业基础知识和教育学等选修科；民国24年又附设劳艺补习班。社会教育也有所发展，民国8—18年，一些中小学开办暑期学校和平民学校；民国19年，县立民众教育馆问世，负责举办和辅导社会教育；民国24年，全县实施儿童与成人合校的国民教育（白天儿童班、晚上成人班），后又曾对青少年文、半盲实施强迫教育；抗日战争期间，全县曾推行“小先生”制，发挥中小学生在扫盲工作中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通教育发展较快。职业教育曾出现二个高峰，1958—1960年间，曾涌现农、工、医、师和戏曲等职业学校（班），鼎盛时达109所（班）、2169名学生；1983年以来，通过中等教育结构改革，6所普通高中改制为职业高中和职技校，

学生1018人(均不含师范、卫校和戏曲班),占高中在校生数的16.31%,门类较多,初步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成人教育曾出现三个高峰:解放初,以扫盲为主要内容,以冬学和民校为主要形式,1952年仅农农业业余学校学员即达76299人;1958—1960年,除农农业业余教育外,以扫盲和技术教育并重为特点的职工教育崛起;1979—1985年,农村已基本扫除文盲,农农业业余教育侧重于科技教育,职工教育则侧重于文化补课和业务岗位培训,致力于提高全员素质。

要优化教育内部结构,就得“三教”一起抓,决不可有任何偏废。当然“三教”中普通教育是主导方面,是其它两教的基础,它不仅要提高自身的质量,而且还得支持其它“二教”,并将职业教育渗透到普通教育中去。嵊县的教育史表明,普教支持其它“二教”不仅绰有余力,而且卓有成效。民国时期,全县曾推行成人与儿童合校的国民教育,实行过“小先生制”。解放初,全县小学将辅导业余教育作为份内工作,并设“社教”一职专司其事。1951年春,崇仁中学创办了全省第一所工农业业余夜中学(此后县内各中学也竞相举办),培养了大批工、农业战线上的骨干分子,深为群众所称道。1976年秋,嵊县中学增办一个文艺班,培训越剧演员和演奏员,后全部学员均为县内外剧团所招用,1986年全国越剧广播大奖赛,获奖的三名嵊籍演员何英、李莉、裘珍媛均出自该班。60、70年代,不少中学曾举办过专业班和短训班,在支援农业方面,也曾起过良好的推动作用。1983年后,部分普通高中改制为职业高中,为时虽短,但已初见成效。

(三)关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发展教育要以经济为基础,发展经济又得依靠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要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就得靠教育起中介作用。

当前嵊县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首先从地域上来看,嵊县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倾斜性,即西乡发达而东乡相对落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与教育的发达程度则关系密切。嵊县教育的现状也具有明显的倾斜性,而且与经济的倾斜状况完全契合。嵊县教育的倾斜性在嵊县早期的历史上并不明显。南宋时西乡有一所书院(也称义塾),东乡则有2所义塾。清代西乡先后有10所书院,东乡则有5所,考虑到地域的广狭,西乡仍不占明显的优势。新学崛起时,西乡开元的绿筠书屋改为开元学堂,首创农村新学,接着东乡华堂的金庭王氏义塾改为金庭高等小学堂,沈家坎也新办剡东公学。抗日战争初期,西乡有私立坎流中学生补习学校,东乡有私立金庭战时补习中学(后又有私立剡东战时初中补习学校,3校均曾在省教育厅立案)。很明显,嵊县两翼的教育通过长期的竞争、攀比和仿效基本上保持了动态的平衡。问题的契机出现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当时先后有5所外来中学、师范和技校栖滞西乡,嵊县中学也离城西迁,再建的嵊县简师亦复设在西乡,后来私立春皋中学、阳山中学又先后在西乡问世,而东乡则尽付阙如。于是原来的平衡状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并且产生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解放后,这种倾斜状况仍长期持续。教育具有滞后性和长效性,对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长期的、多方面的效应。嵊县经济的龙头地区当推甘霖区和长乐区,而这两个区恰好正是嵊县最早的两所私立中学——春皋中学和阳山中学的所在地。嵊县经济与教育在地域上倾斜性的契合,决非历史的巧合。

再从行业上来看。这里仅举一隅。

长期来,嵊县被誉为“丝绸之乡”,嵊县丝厂所产的梅花牌桑蚕丝在海内外久享盛誉,至1985年已连续7年保持了国家金质奖的荣誉,嵊县其它乡镇缫丝厂所产的桑蚕丝质量上也

佳。这与人们长期来在育桑、养蚕、制丝方面重视智力投资有莫大关系。民国18年(1929年),县人金源芾曾创办嵊县蚕桑传习所;民国19—22年,嵊县中学曾增设蚕桑选修课;民国28—31年,省立杭州蚕桑职业学校滞甘霖办学,并挂钩去开元丝厂(今嵊县丝厂前身)实习;民国34年,嵊县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创办,在存世的4年间,设有蚕桑等专业。解放后,在这方面的智力投资更有增无已。1958—1961年,嵊县蚕桑技校开办。1958—1966年间,不少农业中学设有蚕桑课程。1961—1963年存世的嵊县农业学校也设有蚕桑专业。1970—1971年间,嵊县“五七”工农兵学校曾在东郭蚕种场举办蚕桑班。为了提高蚕农育桑养蚕的技术,全县农业部门长期来还举办过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再从微观方面来看。嵊县丝厂从1951年起即举办职工业余教育;1955年又增设初中班;1956年该厂被评为县职工教育先进集体,并派员出席了省扫盲积极分子代表会议;1958—1961年,附设了制丝技术学校,招收2个半工半读班,学员有136人;1960年,嵊县丝厂有扫盲班21人、高小班426人、初中班280人、高中班40人、大专班(设有缫丝等专业)27人;1976—1978年,附设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设有制丝机械等专业,后有12人毕业。真是这种赓续不断、锲而不舍的职业教育造就了数代的熟练劳动者,形成了一条生生不已的人才链,从而赢得了全县蚕桑制丝业历久不衰的优势。

地区和行业的智力优势,必然会转化成地区和行业的经济优势。有志图强者,对此不可不察。振兴经济,当以教育为基。

(四)人才涌现的若干轨迹

人才的涌现有诸多原因,其中教育当为主因。嵊县历史上曾经涌现过不少槃槃大才,其中有的还形成了人才群体和人才链。寻绎轨迹,探索规律,必将有助于人才的培养。

1、人才涌现与时间

(1)南宋的进士群 嵊县从南宋以迄清末(南宋以前不详),及第的进士凡138人,而南宋一朝独占96人。究其原因:①当时政治中心迁至杭州,为士子进阶提供了方便。②教育空前繁荣,书院、义塾、家塾大量问世。③人才群体的影响,当时有两个家族在人才上占有明显的优势,一是周汝士一门“登科者七人”,“举荐者十数人”;二是求移忠、求元忠昆仲及第,他们的子孙以荫附出仕的先后达13人,在周氏和求氏家族榜样的诱掖下,于是莘莘学子,风响景从。

(2)明代的理学家链 理学在嵊县初盛于南宋,鼎盛于明代,其中翘楚为周汝登(号海门)。周为王守仁(阳明)的再传弟子,深得阳明理学之精要,他“以躬行教化为先”,“弟子日益进,执贽者千余人”,影响甚大。其后仍代有传人,如周光临、王国楨、袁祖宪、喻安性等,都有著作行世。通过周汝登诸人的推广、躬践,王守仁“致良知”、“知行合一”的道德理论深植嵊域,不仅出现了明代的理学家链,而且还远播后世,人们在清代、民国时期嵊籍文人的身上仍可依稀看出它深镌的烙印。

(3)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 新编《嵊县志·人物传略》收载人物74个,而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即占17个,如谢飞麟、姚麟、俞丹屏、周志由、童杭时、竺绍康、张伯岐、王金发、周亚卫、尹锐志和尹维峻等在全国全省均有影响,其中不少人为军政界和教育界的两栖人物,他们一方面是革命的先驱,另一方面又是教育的开拓者。由于上述原因,所以在民国时期嵊县多军政要人。

2、人才涌现与空间